

活页文史丛刊

91-120

沁阳师志编印

2027
183
828156

·古典文学专题·

淮阴师专编

治原文史丛刊

91



20134409

唐诗质疑札丛

吴企明

(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

读唐诗，常常遇到一些疑问。有疑问，质诸文史典籍，偶有一得，随手札录，因缀成《唐诗质疑札丛》，请国内治唐诗的同志指正。

傀儡诗非玄宗、太白作

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下云：

“自是圣怀耿耿，但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舞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照小说的上下文意看，这首绝句似乎是唐玄宗自作。宋长白《柳亭诗话》卷十五“傀儡吟”条云：“‘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此明皇傀儡吟也，当是南内后作，回思天宝风流，真是一弹

指间。”“傀儡一作窟磊子，云梁锺诗，疑误。”宋氏也以此诗为玄宗作。

这段文字，亦见于郑处海《明皇杂录》。今本《明皇杂录》未云何人所作，而阮阅《诗话总龟》卷二十五引录《明皇杂录》时，却云：“明皇在南内耿耿不乐，每自吟太白傀儡诗。”以为是李白作的。

这首傀儡诗，既不是唐玄宗写的，也不是李白作的。

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二录梁锺诗，云：“《咏木老人》云：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附注：“明皇还西内，每咏此诗。”吴开《优古堂诗话》“傀儡”条云：“唐梁锺咏木老人诗（文字与《全唐诗话》同，从略），《开元传信记》称，明皇还蜀，尝以为诵，而非明皇作也。观山谷诗：世间尽被鬼神误，看取人间傀儡棚。烦恼自无安排处，从他鼓笛弄浮生。盖自锺意也。”《全唐诗》卷二百〇二收录梁锺《咏木老人》诗。梁锺，天宝中人，令狐楚编《御览诗》，收他的诗十首；芮挺章编《国秀集》，收他的诗两首，称他为“执戟”。

尤、吴两位载唐玄宗自蜀地回京后在西内咏梁锺诗，是可信的。而《杨太真外传》语言过简，使人误以为傀儡诗乃玄宗作，《诗话总龟》更误以为李白作，均非是。

《题昭应温泉》系孙叔向作

《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二收录孙叔向的《题昭应温泉》，诗云：“一道温泉绕御楼，先皇曾向此中游。虽然水是无情物，也到宫前咽不流。”同书卷五百十二收录长孙翱的《宫词》，诗云：“一道甘泉接御沟，上皇行处不曾秋。谁言

水是无情物，也到宫前咽不流。”

两诗诗题不同，作者不同，文字小有出入，但内容基本相同，是重出互见诗。《全唐诗》编者没有发现它们是重出诗，因而两诗题下均未加注。

说《宫词》是长孙翱作的，首见于范摅的《云溪友议》卷十，云：

“时谓长孙翱、朱庆馀，各有一篇，苟为当矣。长孙词曰：一道甘泉接御沟（下同，略）。朱君词曰：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对泣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全唐诗话》卷四“长孙翱”条，有同样的记载，显然是从《云溪友议》中来。

这首诗，该是孙叔向作的。

曾季狸《艇斋诗话》有如下的记载：“韩子苍‘楼中有妾相思泪，流到楼前更不流’，用唐人孙叔向温泉诗：‘虽然水是无情物，流到楼前咽不流。’其诗见顾陶《唐诗类选》，金华瀛湘集作王建诗，非也。”

按顾陶于唐宣宗大中时任太子校书，编选《唐诗类选》，今已不传。曾氏当时还能见到，所以他在《艇斋诗话》中作了上述记载。考孙叔向为唐德宗时人，《题昭应温泉》一诗，早在社会上流传，所以顾陶以之入选。这个记载，较为近实。范摅的世次，后于孙叔向、顾陶，因而把孙叔向误作长孙翱；诗篇在口耳相传过程中，又失去了题名，文字略异，范氏乃漫题为《宫词》，以致造成《题昭应温泉》一诗的重出互见现象。

关于刘禹锡的《忆妓》诗

孟棻《本事诗·情感第一》有如下一段记载：

“太和初，有为御史分务洛京者，子孙官显，隐其姓名。有妓善歌，时称尤物。时太尉李逢吉留守，闻之，请一见。特说延之，不敢辞，盛妆而往。李见之，命与众姬相面。李妓四十余人，皆处其下，既入，不复出。顷之，李以疾辞，遂罢坐，信宿绝不复知，怨叹不能已，为诗两篇投献。明日见李，但含笑曰：大好诗。遂绝。诗曰：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尚可寻。青鸟去时云路出，嫦娥归处月宫深。纱窗暗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此时天上月，祇应偏见两人心。（欠一首）”

这个被隐去姓名的“为御史分务洛京者”，究是何人？《本事诗·高逸第三》说杜牧“为御史分务洛阳”，被隐其姓名的人是杜牧吗？不是的。如果同是杜牧，为什么后文显言之，而前文却要“隐其姓名”呢？显然讲不通。何况，杜牧生活的时代，后于李逢吉，这里的“为御史分务洛京者”，决然不是杜牧。

参证《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妇人”四“李逢吉”条引录《本事诗》的记载，才知道李逢吉所夺之歌妓被说成刘禹锡的家妓。《太平广记》引录的内容，较之通行本《本事诗》，大体情节相同，然有三点明显的区别：一、点出刘禹锡的姓名；二、记事较为详赡；三、刘禹锡拟张衡《四愁

诗》，作诗四首。可见，《太平广记》所引《本事诗》，当别有所据。卞孝萱同志据宋敏求的《刘梦得外集后序》（吴兴徐氏景宋绍兴本）所云：《刘梦得外集》卷七的四首《忆妓》诗，系出《南楚新闻》，因而推断《太平广记》所引材料，乃出自《南楚新闻》，误记为《本事诗》（见《刘禹锡年谱》）。

笔者很赞同卞孝萱同志的推断。因为尉迟枢《南楚新闻》一书，《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今已佚。尉迟枢是唐末人，他与同时代的稗官家犯着同样的毛病，全然不顾李、刘的行实，敷衍《本事诗》中李逢吉夺妓的情事加以渲染，并将《本事诗》所记的一首怀妓诗，和以三首他人诗，合并在一起，漫题为刘禹锡作。宋敏求又未加考证，把《南楚新闻》中的这四首诗，裒辑入《刘梦得外集》卷七，以致造成错讹。

李逢吉夺刘禹锡歌妓这则轶闻，错误很多；刘禹锡《怀妓》四诗，或为伪托，或为他人诗混入集中。事和诗，都经不起考查。

一、刘禹锡从未“为御史分务洛京”。

刘禹锡确实分司过东都，据他的《子刘子自传》云，前后共有三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明年，追入充集贤殿学士，转苏州刺史赐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迁同州，充本州防御长春宫使。后被足疾，改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改秘书监，分司一年。”具体时间是：第一次，大和元年；第二次，开成元年到开成四年；第三次，开成五年。又按，刘禹锡有《荐处士王龟状》，文末题云：“正议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刘某状。”（见《全唐文》卷六百〇三和明刻本《刘宾客文集》；《刘梦得文

集》中的《荐处士王龟状》文后无此段题语。)《旧唐书》本传云：“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可见，刘禹锡除以主客郎中、秘书监的身分分司东都外，还曾以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但是，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刘禹锡曾“为御史”“分司东都”。

二、李逢吉何时留守东都？

李逢吉确曾留守过东都，那是大和五年时事。《旧唐书·文宗记》：大和五年八月壬申，“以李逢吉检校司徒兼太子太师，充东都留守”。这一年，刘禹锡授苏州刺史，冬，自长安起程，路过洛阳时，拜会过李逢吉，有诗《将赴苏州途出洛阳留守李相公累申宴饯宠行话旧形于篇章谨抒下情以申仰谢》，记其事。以后，刘禹锡一直在苏州、汝州刺史任上；李逢吉于大和九年初卒，李、刘无缘再相遇。等到刘禹锡再度分司东都时，李逢吉则早已物故。由此可知，李逢吉在洛阳招延刘禹锡家妓，夺之，刘禹锡怨叹投诗云云，均为虚妄之事，“三山不见海沉沉”一诗，亦是伪托诗。

三、刘损作《愤惋诗》三首。

《全唐诗》卷三百六十一收录刘禹锡《怀妓》四首，编者附注：“前三首，一作刘损诗，题作《愤惋》。”《全唐诗》卷五百七十九收录刘损诗，题为《愤惋诗》三首，编者附注：“一作刘禹锡诗，题作《怀妓》。”两刘三诗，重出互见。

这三首诗，当为刘损作。

刘禹锡诗，气体雄健，意象深远。白居易的《刘白唱和集解》，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禹锡尤长于七律，胡应麟说他：“晚唐无出中山。”（见《诗薮·外编》卷

四》而《怀妓》四首，诗格低卑，诗思冗沓，入梦得集，与其他诗略一对望，绝不相类。

考韦穀《才调集》卷十“无名氏”名下，选录《杂诗》十首，其中七律“鸾飞远树游何处”一首，与刘损《愤惋诗》三首（之二）文字基本相同，小有出入；七律“折钗破镜两无缘”一首，与刘损《愤惋诗》三首（之一），文字基本相同，略有差异。韦编《才调集》时，或因刘损尚未显名于世，他遂编两诗入“无名氏”栏。《才调集》是个选本，仅录了《愤惋诗》三首中的两首。韦的选录，恰恰是《怀妓》诗非刘禹锡作的重要佐证。

刘损是咸通时代人，他和李逢吉不同时，不可能相接，更不会有被夺家妓而作诗抒愤的轶事。他的诗，在流传过程中，很有可能因同姓（刘损、刘禹锡）的关系而被人讹为刘禹锡诗，经尉迟枢之手，误采入《南楚新闻》中。

综上所述，关于刘禹锡的《怀妓》四首，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孟氏《本事诗》所记夺妓事和怀妓诗，是不可信的；

（2）尉迟枢《南楚新闻》敷衍《本事诗》的故事，并误采刘损的《愤惋诗》三首，合并成四首《怀妓》诗，拟张衡《四愁》诗，以为刘禹锡作，大谬不然；

（3）宋敏求不经辨证，居然将《南楚新闻》所记的四首《怀妓》诗，收入《刘梦得外集》，极不妥当，应予甄辨。

“散文”释名

钱 仓 水

(淮阴师专中文系)

“散文”作为一个普通的词语是早就有的，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有“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的话，钟嵘《诗品》有“意浮则文散”之语，指的都是诗歌语言表达中重散而不重骈的一种状态。“散文”作为一个文体专用名称，是直到宋代才出现的；陈善《扞虱新话》说：“后山居士言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这里已把韵散对举（过去称文笔，无韵为笔，有韵为文）。罗大经《鹤林玉露》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这里最早以“散文”与“四六”（即骈文）对称。之后，到了明代，“散文”名称的运用逐步广泛，屠隆称韩愈的文章“仅能捭骈丽为散文耳”（《文论》），吴纳的《文章辨体序说》则更多处运用“散文”这一称呼与“骈文”对举，例如“近代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巧而失大体”（《诏》），“窃尝考之，汉晋皆尚散文……唐宋以后多尚四六”（《表》）等。

读一多先生《张旭年考》

——试论张旭生卒之年

郭元兴

(南京金陵刻经处)

《活页文史丛刊》第3号闻一多先生《张旭年考》，于张旭卒年依苏涣赠怀素诗定于天宝六载(公元747年)，于其生年则依窦冀《述书赋》列名先后定为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二者均发前人所未发，孤明独映，可云卓识。唯张旭卒年，郭沫若先生于其《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论苏涣一章，曾举李白《猛虎行》及世传张旭所书《千字文》残帖二证，推知苏涣诗中“张颠没在二十年”为“张颠没世已十年”之讹，定张旭当卒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立说精当，不可易也。世人或以李诗为伪作，盖以未见张书千文，误以旭卒在前而云然，实非的论。李诗固不容伪，张书千文更不能伪也。关于张旭生年，拙见与一多先生微有参

商。尝试考之，依书法授受源流，虞世南得笔法于僧智永，以授其甥陆柬之，柬之授其子彦远，彦远又授其甥张旭。就亲缘而言，由虞至张不过四代。人之年寿虽有不齐，然传世之年则合数代计之，每与一世三十年之数相近，如孔子传代年数即其显例。近者云南发现《岳氏宗谱》，记岳飞以至于今世，平均一代约二十七八年，亦为一例。姑以三十年一代计，则张旭之生当距虞世南之生90年左右。实则古代世族子弟多早婚，八十之年每已五世同堂。且虞、陆、陆、张四代中，二属母系，妇女更罕迟至三十始育子者。故虞张之间以三十年一世计可云最大限矣。考虞生于公元558年，下数90年为公元648年即贞观二十二年，正贺知章出生前十年也。《旧唐书·贺知章传》特记张旭与贺二人为友，年齿伯仲亦其一因。就寔录所列名次而言，张之名世当早于贺。贺以则天证圣初擢进士、超拔群类科，当公元695年，时年卅七。张此年盖近五十，书法当早成名矣。

传世有狂草古诗四帖墨迹，董香光定为张旭书。旭公生年既已估定，则董说之真自见。丰道生跋谓此帖原有神龙铃印。神龙为中宗年号，距证圣又已十年，当贺知章47—49岁间，张当已逮六十岁，正人书俱老之时。唐世帝王重书，矧此帖龙翔鸾翥，笔力精绝，自为张公登峰造极之笔，其荣膺宸赏，盖非偶然也。观郑虔自书诗画以献，立得明皇三绝之题。则张书之得中宗御鉴宝玩，亦非绝无仅有矣。郑有狂草《大人赋》墨迹传世，气势雄强，若怒鹤排空，然以较张公此卷，则又如鸢飞之望鹏运，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

或谓若定张旭生卒为公元648—759年，则张旭在世之年当有112岁，不太长欤！古今史家每于年过百岁者多

不置信，盖徂于“人生七十古来稀”之俗说而然也。实则近世人口调查资料渐丰，始知年过期颐者，虽非多如过江之鲫，但亦非少如凤毛麟角，即二百岁左右之人亦非子虚乌有。如日人满平生于公元1602年，至公元1844年已242岁，尚且健若常人。近巴基斯坦一老妪120岁时齿落重生、发白返黑，147岁始卒。报载巴西一老者已逾161岁，今仍健在。此皆其彰彰特著者也。张公之年视此数老又若童稚之望毫耄矣。

又前述传世张旭草书庾谢诗四帖，古人所以难定主名者，盖以原有神龙钤印，而世传旭与湖州包融、扬州张若虚、永兴贺知章四人开元初俱有名，号“吴中四士”（见《全唐诗·包融》），似旭开元初始显，不应前此书迹即入宫禁也。然《唐诗记事》述贺知章事云“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文词俊秀名闻上京。足见贺、张、包等神龙中已蜚声京华矣。此文中列名未及张旭，盖旭以书法显，此文单指文词俊秀之士，故略之耳。然依寔息之文，旭应先贺，则其知名当在神龙之前，断可识矣。如是则旭书之得邀中宗赏鉴又何疑耶？

就草法之演变而言，自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孙过庭之序《书谱》，至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怀素之书《自序》，正九十年。孙书尚谨守二王矩矱，素书则已尽决六朝藩篱。鲁公曾得张旭心传，于素书则许其“若还旧观”，谓其形似旭书也，然又惜其未能为“入室之宾”，谓其尚有一间未达也。使无古诗四帖墨迹幸存，素公《自序》又何尝非千古绝作。然今试一比观，则旭作“矫如群帝骖龙翔”，不可方物，素师虽“纵横不群”，终不过“奔蛇走虺”之雄

而已。古人龙蛇之喻，非虚拟也。

《国史补》记旭尝自言见公主担夫争道及公孙大娘剑器舞而草法入神。就当时情事而言，公主自非太平莫属。旭草以观公孙之舞而得神，则旭之草可云公孙舞姿之写意矣。陈旸《乐书》云“唐自则天末年，剑器入浑脱，为犯声之始”，足见公孙此舞创于则天末年。杜甫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见李十二娘舞剑器，谓其“亦匪盛颜”，又谓公孙大娘于晚年得李为弟子（“晚有弟子传芬芳”）。所云“金粟堆前木已拱”，当指公孙氏早已没世。李非盛颜，至少应有四十岁。剑器浑脱为武舞，非童习莫办，从师之年姑以十岁计（白居易《琵琶行》云“十三学得琵琶成”），当不甚远。公孙晚年始得李为弟子，至少应在五十岁时。如此则公孙之生当在杜李之会八十年前，即公元前687年，则天之垂拱三年也。由此年下数至神龙元年为十九年，至开元二年为二十八年，正公孙氏玉貌锦衣、色艺双绝之年也。此一估计年代之准确度如何仍可以杜诗验之。杜诗所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飒沓昏王室”，旧解均以“五十年”为指杜于开元二年初见公孙大娘至大历二年又见李十二娘之五十四年（公元714—767年）。然依诗中上下文义，此五十年实谓禄山作乱前之五十年（注一），即自神龙元年至天宝十三年之五十年（公元705—754年）也。杜诗作于代宗时，所言“先帝”自可上推至中宗时，陈旸言则天末年（长安：公元701—704年）始以剑器入浑脱，杜甫又言“晓是舞者，公孙一人而已”，可知剑器浑脱为公孙氏首创独擅之艺。若其入宫授技在神龙初，则张旭之于邺县（今河南安阳）数见此舞之时当在神龙之

前（注二），即则天末年也。公孙氏健舞之“浏漓顿挫”不可见，然旭书既得神于公孙氏之舞，则其羿射九日之姿，群龙矫翔之态，雷霆蕴怒之势，江海凝光之奇，观玩旭书，“即公孙可知矣”。

注一：杜诗所云“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子弟散如烟”，与白居易诗“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李商隐诗“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所指为同一历史背景之不同画面。

注二：杜云内伎坊及外供奉中晓剑器浑脱之舞者，“公孙一人而已”，又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可知则天末年以剑器入浑脱为公孙氏首创之艺。公孙氏原为外供奉，初在民间演伎，以超群冠时而得入宫禁（先帝侍女）为梨园班首。然宫女本有年长出宫之制，公孙氏出宫后自必仍操故业。由此可推知，张旭之于邕县见公孙氏当在神龙之前，自神龙之年至开元二年之十年为公孙入宫时期，杜甫于开元二年在郾城见公孙演伎，则其甫出宫禁之时也。

附：张旭年表

- 公元638年，贞观12年 虞世南卒，年81岁。
- 公元648年，贞观22年 （张旭应生此年前，姑以此
年为其一岁）
- 公元659年，显庆四年 贺知章生。（张旭11岁）
- 公元687年，垂拱三年 孙过庭四十余岁，序《书谱》
（张旭40岁）
- 公元695年，证圣元年 贺知章37岁，擢进士。（张旭
48岁）
- 公元701，武后长安元年 李白生。公孙大娘创剑器浑脱
舞，张旭数于邕县见之，自此
草书长进。（张旭54岁）

公元705年，中宗神龙元年

公元709年，景龙三年

公元715年，开元三年

公元743年，天宝二年

公元746年，天宝五年

公元759年，乾元二年

公元762年，宝应元年

公元767年，大历二年

公元768年，大历三年

公孙大娘入宫为侍女。（张旭58岁，书庚谢诗帖）

颜真卿生。（张旭62岁）

杜甫四岁，于郾城见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张旭68岁）

颜真卿再见张旭传笔法十二意。（张旭96岁）

贺知章卒，年88岁。李邕被杖死。（张旭99岁）

张旭卒。（张旭112岁）

李白卒。

杜甫56岁，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苏涣作《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张颠没世已十年”。

李白《草书歌行》的真伪

——读《张旭年考》小记

周本淳

（淮阴师专中文系）

闻一多先生气节文章，夙所钦佩。近读其遗墨《张旭年考》及孙望先生跋语，犹想见其关心时事而锐意治学之风采。惟文中举李白《草书歌行》“张颠老死不足数”为证，

似一时疏忽，盖此诗绝非李白所作，爰检数年前札记一，则录以就正于方家。《草书歌行》原诗不长，就清人王琦注本全录如下：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怳怳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蛟龙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

——《李太白文集卷八》

《宣和书谱》里讲到怀素书法时有这样的话：“一时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窦息，钱起之徒，举皆有诗美之。”实则李白这首诗很不可靠。

李白诗在宋初只有七百多首，宋敏求、曾巩等增加到九百多首，伪作很多，这首诗也在其中。根据是两方面，一是这首诗本身词气不类，情理不合；二是《怀素自序》未提。

（苏）东坡云：“近见曾子固编《太白集》自云颇获遗亡，如《赠怀素草书歌》及《笑矣乎》数首，皆贯休以下词格。”

东坡云：“今《太白集》中有《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间学齐己辈诗也。”

（均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

王琦注里引了前人意见又加了按语：

苏东坡谓《草书歌》决非太白所作，乃唐末五代效禅月（即诗僧贯休，引者注）而不及者，且誉其“笺麻绢素排数厢”之句村气可掬。《墨池编》云此诗本藏真（怀素字藏真，引者注）驾名太白者。琦按以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按指杜甫《饮中八仙歌》），而作诗称“胸藏风云世莫知”（按见李白《猛虎行》，萧士贇以为伪作，非。复旦《李白诗选》定为至德元载公元756年作）之句，忽一旦而誉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无疑。

王琦是根据这首诗词气不类和情理不合而“断为伪作无疑”。

另外明朝胡应麟在《诗薮》里则就《怀素自序》本身论证此诗为伪作。

“《太白怀素草书歌》，诚为伪作，而校者不能删削，以无佐验故。今观素师自叙，钱起、卢纶等句无不备录，顾肯遗太白？此证甚明。”（按卢纶当为卢象，《诗薮》误记）

（《诗薮·内编卷三·古体下·七言》）

《怀素自序》列举从颜真卿到钱起一共十多位名诗人来标榜自己的书法造诣，都没有提到李白，李白生前的诗是压倒当代的。自序帖写在大历丁巳十月（十二年，公元777年），李白前死已十五年。如有此诗，怀素必然要引到。这条理由是很有说服力的。

我们再从《怀素自序》里谈到书法的问题来加以论述。